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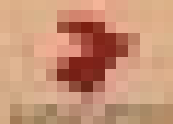
三维文化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

王征国◎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三维文化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

张其成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三维文化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

王征国◎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维文化观：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 / 王征国
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171 - 0868 - 9

I. ①三… II. ①王… III. 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5073 号

责任编辑：少 云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5.5 印张

字 数 439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0868 - 9

序

丰子义

王征国教授撰写的《三维文化观——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一书，选题意义重大。它不仅对于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梳理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目前国内同类著作相比，该书问题“真实”，针对性强，视野开阔，分析深入，是一部很见功力的力作。

本书开宗明义地提出：何谓文化观？它指的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灵魂的观念形态；何谓社会主义文化观？它指的是认识和把握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和根本方法；何谓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新”就新在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观，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观，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它有着全新的精神内核和全新的实践体系。全书以此为宗旨开拓性地展开了研究，明确提出了三个不同等级的规律，即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最普遍的规律，包括研究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特殊的规律，包括研究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个别的规律，包括研究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构成和对外传播，以及精神家园的建设等。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化，一种新文化观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文化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因素并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历代领导人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集中全党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对中国文化的一



系列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观,沿着探索中国革命时期的文化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观——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历史轨迹,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本书以此为内容,全方位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维文化观及其中国化,以实事求是论、解放思想论和先进文化论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理论原则,并把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作为新的历史起点,逐步形成了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才建设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观、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胡锦涛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等在内的完整的新文化观,概述和展开了文化结构的三维态势、文化功能的三维释放、文化价值的三维整合、文化传播的三维方式,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实现“中国梦”的三维方法、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等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从而构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体系。

本书采用了历史的、叙述的和实践的三维研究方法,使全书浑然一体,特点明显。历史的方法——第1~5章,以历史的感染力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化,使之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叙述的方法——第6~9章,以逻辑的穿透力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叙述,内容新颖、见解独到;实践的方法——第10~15章,以实践的创造力对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实践体系进行了探讨,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和运行机制在此得以充分发挥。其中,第十四章实现“中国梦”的三维方法和第十五章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揭示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已经形成了习近平以“中国梦”为实践指向的文化战略观,包括传统文化观、法治文化观、治理文化观。从而为学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供理论辅导资料。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关于文化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资料丰富,旁征博引,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活泼生动,可读性强。特别是作者所列出的参考文献,为同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文献平台。在此,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CONTENTS

导论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产生背景与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产生背景	1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方法	10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理论原则	18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三维文化观	2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存在观	2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观	3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45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观	55
第一节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55
第二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69
第三节 毛泽东文化政策的失误	84
第三章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91
第一节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观	91
第二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98
第三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规律	104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	110
第一节 江泽民的三维文化观	110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117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	124
第五章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和谐文化观	132
第一节	胡锦涛的和谐文化观	132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40
第三节	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	147
第六章	文化结构的三维态势	155
第一节	文化业态	156
第二节	文化形态	168
第三节	文化生态	178
第七章	文化功能的三维释放	185
第一节	以文化人	185
第二节	以文化印	199
第三节	以文化国	207
第八章	文化价值的三维整合	216
第一节	文化价值的三维属性	216
第二节	文化模式选择的价值整合	223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模式选择	230
第九章	文化传播的三维方式	239
第一节	传统传播方式	240
第二节	现代传播方式	245
第三节	未来传播方式	248
第十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55
第一节	以全体公民为服务对象	255
第二节	以有限政府为服务主体	259
第三节	以增强实力为服务举措	262



第十一章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	268
第一节 现代文化产业概念	268
第二节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275
第三节 现代文化产业制度	282
第十二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	287
第一节 传承方式	288
第二节 传承内涵	292
第三节 传承保障	299
第十三章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303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303
第二节 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	312
第三节 公民的核心价值观	323
第十四章 实现“中国梦”的三维方法	333
第一节 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方法	334
第二节 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方法	339
第三节 实现“中国梦”的未来方法	348
第十五章 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356
第一节 提升传统文化	356
第二节 培育法治文化	363
第三节 创新治理文化	370
本书参考文献	388
后 记	396



导论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产生背景与研究方法^①

何谓文化观？它指的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灵魂的观念形态；何谓社会主义文化观？它指的是认识 and 把握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和根本方法；何谓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新”就新在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观，也不同于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观，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观，它有着全新的精神面貌、全新的精神内核和全新的实践体系。这也就是本书所要研究和把握的三个不同等级的规律，即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最普遍的规律，包括研究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特殊的规律，包括研究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这是个别的规律，包括研究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构成和对外传播，及其渗透于当今改革、发展与稳定之中，贯穿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精神家园建设。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产生背景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产生，以中国近代三种文化的并存与竞争为背景。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那文化大潮汹涌澎湃的年代。自晚清到民国

^① 本章由王征国、顾水洋撰写，以《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为题，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以来的百年中国，变故迭起，军阀混战，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了第一位，以寻找解救近代中国的正确道路。当时中国人面前有三条道路（或称三种文化）可选择，港台学者通常称之为：第一是资本主义道路或称选择自由主义文化，第二是社会主义道路或称选择激进主义文化，第三是东方文化主义道路或称选择保守主义文化。就当时情势论，前两种文化无疑处于优势。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处在世界历史的浪尖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社会主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为农民阶级所拥护。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传统是人人须臾不可离弃的。因之，如何利用传统从而达到抵御其他两种文化的目的，便成了保守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主流文化

近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它从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里诞生，一经诞生就无情地吞噬掉母体，并将其势力伸向世界各地，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安排人类历史的秩序。关于这一世界历史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作过十分精当的描写。这些文字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将以何种眼光看待近百年中国思想史上的有关文化定向问题的论争。今天来读这些文字，仍可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表述而折服。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资产阶级兴起于西方，并由此向全世界辐射开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描述的世界历史运动实质也就是近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过程，亦可简称为西化的过程，或曰资本主义化过程。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一过程由“经济规律”所决定，所体现的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英国人在印度领土上的殖民统治，一方面给予道义上谴责，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里，马克思写道：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③

① “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原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甚理想的一面。它撕破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过去是政治权力和世袭身份决定一切，而现在是金钱决定一切。由于对金钱的追逐，社会竞争激烈，阶级分化激烈，并产生一大批与之对抗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又决定着劳资双方很难有着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在当时，资本家只有靠剥削工人而发财，而工人阶级觉得，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最后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常常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以致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正是在对上述现象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结论，从而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送进坟墓。

历史是需要时间来评判的。对某一历史事物或某一社会思潮的评价，往往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行程之后方可看得清楚。近代资本主义的残酷性、野蛮性以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就现在看来，只是它新生时期不可避免的磨难，而不是它行将就木的征兆。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一跤跌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意味的就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殊不知，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起点当成了终点，把刚刚学步的孩童当成了垂暮的老翁。^①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势不可挡的侵入，他们想彻底和传统思想观念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1926年，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对这篇文章的主旨，他在1935年6月22日所作《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是这样概括的：“……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

^① 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页。



上世界化的路。”^①此文发表后，潘光旦撰文说，文中一个词可以译为“全盘西化”，但他认为不确切，不同意这个说法。胡适申述道：“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②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充分世界化”就是“充分采用世界文化”。胡适等中国的先进文化人，高高举起了西方“德（Democracy）先生”“赛（Science）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他们激烈反传统，也是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科学和民主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有杀伤力的。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时，科学有时会插不上嘴。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适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分、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如果用科学作标准，古代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程朱、王阳明，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来衡量。唐代的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旷达，列了一大堆，也都和科学没有关系。中国的写意画，也无所谓科学。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鲁迅不相信，连家世显赫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他的曾祖、祖父都擅长中医，他还是不相信。但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所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引导人们走向

① 《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② 《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现代文明可赋予理性和方法，另一方面虽不一定割断传统，却足以让人们失去对传统的温情。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的反传统和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应是不争的事实。^①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从历史的渊源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就西方社会而言，它始于柏拉图，经中世纪天国说，到近代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然而马克思之前，这种社会思潮只停留在思想家的幻想之中。虽然有少数几位思想家曾试图在小范围内付诸实践，但都不免失败。只有马克思这位既具有诗人情感又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思想巨匠，通过自己的一套革命理论，不仅西欧的无产阶级被唤醒，就连东方各国的劳苦大众也深深为这一主义所吸引，尤其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现实。

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先进的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① 参见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载《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选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2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就在《新青年》创刊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陈独秀便一改其文化主张，从张扬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1919年1月，他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放在《新青年》上发表。同年12月，写作《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旗帜鲜明地批判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此后，陈独秀连续撰文，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财产工商阶级”的民主，是“金钱政治”，不能作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人所要求的应是“无产劳动阶级”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一方面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主张中国人应向西方人学习科技。陈独秀在致罗素的公开信中批驳说：中国要发展工业和教育，固然不错，但不是要向西方人学习，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1922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标志着陈独秀已经完全转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理论家。相比于陈独秀，李大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早。1918年11月，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不久以后，又写过《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预言“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又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这种思想转型的原因，他自己曾作过如下说明：“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两种文明本身之觉悟万不为功。”^①

耐人寻味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西欧，其结果却没能在西欧各国付诸实践，反倒是在贫穷落后的东方社会找到了它生长的土壤。这只能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实践中寻找答案。晚年马克思把视线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②，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大胆构想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最为闪光的亮点。列宁根据这一构想，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也阐明了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

①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原载《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②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强迫败军必须通过一个弓形的牛“轭”，以示污辱。马克思借用这件事，说明像俄国这样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落后国家，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灾难而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立，标志着我们实现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符合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的，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程，首先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跨越。从现实来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发展中的国家相比也还有较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商品化与市场化、现代化与全球化，从生产力方面最终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是“不够格”。就是说，如果用马克思当初设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对于搞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够格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从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上倒退回去。如何解决这个既要搞社会主义又“不够格”的矛盾呢？就要老老实实在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落后国情，承认我们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与右倾错误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它又说明，要彻底跨越这个峡谷，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以与“左”倾错误划清界限。

三、东方传统主义文化

兴起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在东方社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却未能被这里所有人所接受。尤其在社会上层，抵触的情绪更为强烈。因为从马克思所设计的蓝图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同样是反传统的。它既反资本主义的文明传统，也反封建主义的文明传统。换言之，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东方社会的文明传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而在许多固执于传统的东方人看来，这两种力量都是异己的，都是洪水猛兽。而且，这两种力量的介入，皆借助于血与火的方式。资本主义通过殖民统治，用武力推进其文明在东方世界的传播。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构不成民族冲突，但同样是借助于暴力的，用革命的方式否定既有的社会秩序。由于民族情绪和阶级冲突的双重忧虑，以致许多东方的文化人既反对资本主义的传入，又反对社会主义的传播。在他们眼里，前者为“西化”，后者为“俄化”，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进犯。这为东方